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 包产到户变迁问题研究

张海荣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

包产到户变迁问题研究

张海荣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包产到户变迁问题研究/
张海荣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200 - 07954 - 8

I. 2… II. 张… III. 联产承包—研究—中国 IV.
F32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3999 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包产到户变迁问题研究

20 SHIJI WU-LIUSHI NIANDAI ZHONGGUO
NONGCUN BAOCHAN DAOHU BIANQIAN WENTI YANJIU

张海荣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 bph. com. 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北京华洋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 1168 32 开本 7.25 印张 200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07954 - 8
F · 401 定价: 2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序 言

被冠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包产到户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终于获得合法地位，在历史舞台上尽放光彩。作为一种农业经营模式、一种土地产权制度，大包干由最初的 15 年延长至 30 年，1998 年江泽民同志视察小岗村时曾宣布“三十年以后也没必要变”，2005 年人大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又进一步阐释为“永远不变”。与此同时，自 2003 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生效至 2007 年《物权法》的颁布，这一基本的土地制度也在法律层面上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总之，以“法”为依托的家庭承包制正在对中国的农业增长、农村经济繁荣、农民自身发展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近些年，随着“三农”问题的日渐升温，在家庭承包制备受瞩目的同时，理论界与学术界也在追溯和探究它的往昔——包产到户的浮沉变迁。然而，关于集体化时期农村改革问题，现有的阐释总让人感觉还缺点什么，许多看法有失中肯与深度。令我高兴的是，张海荣的论著《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包产到户变迁问题研究》即将付梓，某种程度上可以填补这样的缺憾。几年前，作为我的博士研究生，海荣在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可能是受到了我的影响，因而将研究题目定为

农业合作化以后，党倡导的互助合作处于一种矛盾的情境中：由于生产关系与现实生产力相脱节，刚刚加入互助组或初级社的社员不能适应这种快速变革；而决策领导层按照自己的逻辑思维，将本应当通过渐进式发展生产来解决的历史任务，用短时间突击运动的方式加以解决。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民，很大程度上是非自愿地加入集体组织。结果，所建立起来的高级社问题丛生，整顿和巩固十分艰难。特别是，囿于监督成本太高，集体经营管理始终无法有效地克服出工不出力、搭便车等问题。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另辟蹊径。包产到户作为解决农业合作化遗留问题的方法应运而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包产到户不断地变迁，主要表现为1956—1957年、1959年、1961—1962年包产到户的兴起与衰落。而伴随着沉浮变迁的是，这一制度始终暗流不断。

第二章至第四章 分别从农民、地方干部、中央决策层三方面，探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的变迁原因。第二章着重分析农民的选择及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包产到户起起落落、暗流不断的动因，在于农民的选择与推动。那么，在众多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农民为何对包产到户情有独钟？

1. 从理论上分析，包产到户的制度机理及对客观环境的适应性符合当时农业的生产要求

首先，包产到户能将劳动的数量与质量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可以克服包工责任制的弊端。其次，包产到户以农户为承包单位，有利于扩大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可以克服集体经济管理过分集中、缺乏自主性的弊端。再次，包产到户有统有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既能调动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又能发挥集体统一管理的优越性。最后，包产到户适应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生产的客观环境。

好；同时也受传统文化、国情资源禀赋以及农业生产规律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因而，论著从农民选择、地方干部行为取向、中央决策层定夺以及历史审视的角度对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的变迁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应当说，这样的立足点既全面也符合实际，大大提升了该著作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关于包产到户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合法地位的缺失问题，作者在对党的思想理论、领导人主观偏好等因素进行探讨的同时，非常有创见地将这一问题置于国家工业化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来看待，提出了“农业集体经济取代家庭经济缘起于国家工业化的迫切需要，‘工占农利’的组织部署难以容忍包产到户的‘冲击’”等观点，这种分析很有开拓性。仔细阅读会发现，论著还蕴藏着其他亮点，例如，对地方干部行为角色的论述、对农民社会心理的描绘与剖析等，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此外，论著反映出作者知识面较宽，治学态度很严谨。研究中，作者综合运用了社会学、政治学、制度经济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对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包产到户的起落变迁进行了分析，述论结合，有理有据。在运用资料时，做到了准确规范；在文字表达上，做到了流畅、精练、完整，尤其是在成书过程中，作者用了近三年时间对博士论文不断地进行修改与完善，直至有了今天的专著出版。

当然，这本著作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尽管作者竭尽全力地收集资料，但是由于重要当事人大都作古、相关历史档案中县级以上的常委会记录还没有开放，某些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总而言之，对于研究当代中国史特别是“三农”问题的学者来说，对农村改革的现实和历史的反思是一个长期不懈的每日必修之功，而通过对历史的深刻了解与认知将这种反思带到人们的实践中更是任重道远。希望海荣锲而不舍，笔耕不辍，有新的

论著问世。

王顺生

2009年5月于世纪城时雨园

内 容 提 要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改革的闸门，引发的巨大变化震荡了中国人的心灵，由此产生的反应是各式各样的。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人们似乎无暇反观历史，也许已淡忘了这一制度的渊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历史是割不断的，今天是昨天的继续，理解昨天是把握今天的一把钥匙。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包产到户是试图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遗留问题而出现的。这一制度的基本内涵是，承包土地的农户完成任务后，将包产部分上缴生产队，生产队按原定指标拨付生产费用和工分，实行统一分配。此时的农户仅是一般的生产单位，还不是事实上的经营主体。但是，相对于高度集中的统一经营与统一分配而言，这样的制度安排让渡给农民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与剩余收益权，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而，包产到户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遭到挤压，经历了不断的沉浮变迁。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改变、变革、改进等，制度变迁过程实质上是制度的替代、转换的过程，其中包含制度的创立、变更及随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制度变迁也可以视为现有制度（起点模式）转变为另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目标模式）或是目标

模式对起点模式的替代等。从制度变迁的定义中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影响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是人，制度的设计虽然不能脱离客观的环境，但毕竟是人为的选择，人的有限理性和行为偏好能深深地影响制度的形成与改变。

基于此，农民、地方干部、中央决策层是本著作中对包产到户的变迁进行考察的三个最基本的维度。因为在农业经营制度的选择和运行中，农民这一实践主体的偏向至关重要；至于广大的地方干部，因其上联中央、下系农民，对中央的政策执行及对农民的偏好选择都会有不同的回应进而影响制度的变迁；而中央决策层，作为统领全局的决策中心，其价值理念和行为取向对制度选择与制度变迁产生着决定性效应。进一步讲，对农民、地方干部、中央决策层这三个考察维度的设置，来自笔者对农业制度选择与运行主体的主客观理解。这种理解告诉人们，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发生、发展和变迁正是在这三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展开的，任何一种变量都不完全具有独立影响包产到户制度变迁的能力。而它们之间的实际关系如何，经历了怎样的一个互动过程，以及它们又是如何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决定了包产到户的命运与走向的，则是笔者要在论著中探讨、阐释和提炼的主题。

为达到期望的研究目的，本著作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论述：绪论部分概述选题意义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包产到户变迁的研究成果，界定文章中涉及的核心概念，并指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具体如下：

第一章 回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缘起与变迁的轨迹。历史有其不可忽视的参照性，为深入地剖析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找出其利弊得失，进而挖掘出包产到户产生的缘由，本章首先对传统的农业生产互助、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所主导互助合作的价值关怀及其嬗变进行仔细的梳理与对照。通过梳理与对照指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包产到户变迁问题”。说实话，当时我很支持海荣的这一决定，她在攻读博士研究生之前已在“三农”问题上具备一定的研究基础。再者，她从小在农村中长大，对乡村的人情世故及生产、生活轨迹有着较深的感悟。记得她确定研究题目后，我曾开玩笑地说：“海荣真的要扎根农村了。”

师生间的交流与沟通是令人愉快的，但我明白海荣的研究之旅将会十分艰辛。因为从事这一研究不仅需要尽可能地收集文献、档案、口述记录等资料，还得具备开阔的视野，否则难以超越已有的研究而失去学位论文的意义。所幸，海荣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聪慧的头脑、较强的科研能力及吃苦耐劳的韧劲，将这个题目做得有章有法。2005年论文定稿后，在评审与答辩过程中获得专家们一致好评，其中一些独到的理论观点现已刊载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核心期刊上，且大都被报刊复印资料转载。

即将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专著，围绕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包产到户变迁问题”，以农业集体化盛行时期为背景，系统地展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缘起及其曲折的起落变迁，向人们提供了许多关于集体化时期农村改革的信息。其核心内容是，作为今天稳定的农业经营形式与土地产权制度，它在昔日如何缘起并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为何民间的诉求难以上升为党和政府法定的政策？围绕着这一主线，论著在揭示人与地关系的同时，重点揭示了人与人、人与制度的关系，相应地确立了较为严密的表述逻辑与分析框架。

具体地讲，论著的作者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的缘起与农业合作化运动息息相关，是对合作化运动失误的补救，这一制度的不断起落变迁主要取决于农民、地方干部、中央领导层的价值理念与行为取向，即取决于人的行为偏

2. 从经济角度分析，农民选择包产到户的直接原因是其产生的绩效满足了农民需求

一是包产到户使农民获得了切实利益。具体体现在：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农民的口粮不断增加，有了生存保障；家庭副业有了发展，农民增加了口粮外的收益份额，提高了生活水平。二是包产到户克服了集体经济中久治不愈的顽症。顽症的消除，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倍增，进一步拓展了其获利空间。

3. 从社会心理层面分析，包产到户在农业集体经营管理的“帷幕”中打开一个缺口，某种程度上使农民本原的社会心理得以恢复，使淤积在其心头的压力得以释放，起到了类似社会“调试剂”与“减压器”的作用

其一，包产到户调整了合作化后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非本原的社会心理。其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包产到户，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乡村经济领域的一场变革，其携带了若干对乡村政治和社会领域进行冲击的因子。因而，这一制度在使农民得到物质收益的同时，也使他们获取了某种程度的身心“自由”。

第三章 分析地方干部的价值观、行为取向及影响。地方干部是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者，反过来也是中央决策过程中的信息提供者；地方干部又是广大地方的治理者。很明显，其既联中央又系地方。因此，处于这样特殊位置、兼具双重身份的地方干部，其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历史变迁。

1. 地方中高层干部的价值观、行为取向与包产到户的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尽管行政管理高度集中化，但省、地、县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服从和依赖中央的同时还是具有一定的决策权。另外，由于受所辖区域内政治、经济、环境、人文等因素制约，处于行政坐标体系中的这些中高层干部，在执行公务时往往要考虑本地实际、群众愿望、自身利益与处境，因而面对复杂政

务会有着复杂的思想与行为表现，而不仅仅是依赖与服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如何对待包产到户这一问题，中高层干部表现出不同而复杂的价值行为取向，归结起来，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本着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原则，主张进行谨慎试验与推广，积极倡导包产到户；另一种是过分注重上级旨意，基于教条式理论认识对包产到户进行批判。某种程度上，包产到户的大规模起落与这两种取向不无关系。

2. 基层干部的价值观及行为取向与包产到户的变迁

基层干部是政策的实施者。与中高层干部相比，他们在行事逻辑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其身处基层，更了解鲜活的实际信息，因而对基层的实际情况体会得更为深刻；另一方面，除公社层级的主要干部外，大队干部与生产队干部都是农民身份。所以，在政策实施时，他们并非完全遵守上级的规则，往往有着自己的一套行事逻辑。这种逻辑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得以生动地展现，并影响了这一制度的变迁。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的组织特点使公社干部有着兼管基层农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权力。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家庭与生产队是重要的“初级行动团体”，公社与大队是“次级行动团体”，可见公社干部对农村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等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研究包产到户的沉浮变迁，就不能忽视公社干部在其中的作用。笔者通过翻阅若干档案和其他文献资料，仔细梳理后发现，公社干部在包产到户上确实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及行为取向。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一般情况下，不反对搞包产到户，当上级要求实行时，他们积极配合；当上级要求禁止时，他们常常消极对待，迟迟不愿纠正；当然，也有公社干部认为包产到户不符合政治方向，不敢或者不愿倡导实行。总之，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公社干部出于对实践成效、民众意愿、复杂政务直接处理上的畏难以及上级链条太多、旨意难以把握等

因素的考虑，在政策实施时，确实表现出令行不一。大量事实说明，在影响包产到户变迁的诸因素中，公社干部阶层的取舍无疑构成了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变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队干部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一般情况下更可能向农民一方倾斜，例如当农民积极行动起来，要求实行或者已经落实了包产到户时，一般都能得到他们的理解、认可甚至保护；或者，面对农业生产的不断衰退，大队干部有时会积极主动地倡导包产到户。就生产队干部而言，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其思想及行为取向自始至终都与农民同步。总之，种种原因使得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大都能够与农民同心协力。而这种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努力，是包产到户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遭遇多么大的打击，始终能迅速兴起并暗流不断的重要因素。

第四章 集中分析中共中央的决策及影响。在当代中国，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及相应重大决策对社会的发展变迁具有决定性意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包产到户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兴起，但最终都衰落下去。究其原因，关键是未能获得中共中央的决策认同。基于此，本章将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首先梳理中央决策层面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认识及决策脉络，进而对包产到户合法地位的缺失作深入的分析，并以此为关键点力图对这一制度的变迁作出进一步解答。

1.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中央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认识及决策历程

具体体现在：1957年整风反右前后，中共中央对包产到户的态度经历了由不明朗到不公开否定的转化；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对包产到户由未列入议事日程到迅速地否决与批判；1962年北戴河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由认识统一到分歧直至决策否定。

2.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包产到户合法地位缺失的深层原因

其一，从理论角度分析，包产到户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相应的支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时代的限制，特别是囿于过去长期经济文化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所造成的国家和社会没有分离、个体价值被忽视、平均主义泛滥等因素影响，党中央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未能突破“大而公”模式的束缚。因此，作为家庭经营的包产到户，因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自然难以取得中央的认同。

其二，从经济角度分析，包产到户“有悖”于国家工业化战略部署。农业集体经济取代家庭经济缘于国家工业化的迫切需要；“工占农利”的组织部署难以容忍包产到户的“冲击”。可见，在国家工业化战略下，尽管包产到户有显著的效率，并深受农民欢迎，但不符合中央的意图及部署，终究未能成为农业发展的转折点。虽然中央在否决包产到户时，更多地表现出意识形态上的判罚，而国家工业化战略这一深层根源，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忽视。

其三，从领袖个人因素分析，包产到户没能取得最高决策者——毛泽东的认同。具体地讲，包产到户刺激了毛泽东内心的某种“隐痛”，与其心中的理想道路也不吻合；在毛泽东共同富裕的思想中，强调富裕的同步性、平均性，可以说这种价值取向成为其排斥包产到户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毛泽东的利益观而言，其注重的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而包产到户过多地体现了个人利益，这无形中加深了毛泽东的反感。

第五章 探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包产到户变迁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并提升出若干启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包产到户作为农民创造的诱致性制度，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氛围下，虽屡遭排斥仍暗流不断。某种程度上，其体现了历史的继承性：在中国的资源禀赋与制度传统下，包产到户本质上再现了农

地经营方式与产权制度的路径依赖；同时这一制度也折射出家庭适合农业经营的深刻机理。

总之，围绕着包产到户责任制变迁及其成因的分析，从中可以得到若干启示，即尊重农民群众，发挥这一初级行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搞好农业生产经营及推动制度变迁的中心环节；创设和谐与合理的政治经济机制，使地方干部在制度变迁中起到良好的连接作用；在农村经济制度的调整与变迁中，国家应定位好自身角色与指导边界，发挥真正优势作用；制度选择与创新必须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及其发展水平。

Abstract

The household production system in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 in the 1950s ~ 1960s appeared as a remedy for some faults in the course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whose the basic intension meant fixed output quotas be turned over the production team to tribute partly and appropriate producing cost and work points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index after peasant households finishing the contractive task. At the same time, peasant household was only a general production unit not a management mainstay in fact. However, contrast to highly centralized management system, the household production system gave peasants certain decision-making power in operation, income right and some space for peasants' enthusiasm for production. Regrettably, this system went through the constant up-and-down changes in the 1950s ~ 1960s.

System changes refers to the change and improvement of system, etc., whose course is the substitution and conversion of system in

fact,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change and break of system over time. System changes can be regarded as existing system (starting-point mode) becoming another kind of highly beneficial system (goal mode) or goal mode substituting starting-point mode, etc.. All together,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rom the definition of the changes of system is: man is the key factor influencing the changes of system, with his limited reason and different behavioral partiality.

So peasants, local cadres, central policy-making level are three most basic linking degrees used to investigate in the changes of the household production system in this text, which expresses author's som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to agricultural system and its operator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household production system launch among the reciprocation of three variables, one of these does not have ability to independently influence the changes of this system, how the actual relation is to be and what kind of an interactive course is experienced between them, especially how to determine to the destiny of the household production system is the theme that author will probe into, explain and refine in the thesis. In a word, with the visual angle, author offers a case of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changes of the household production system in the 1950s – 1960s while expressing herself some understanding to this course.

There are five chapters in this paper.

Chapter I retrospect the history of genesis and changes of the household production system in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 in the 1950s ~ 1960s. There is its reference that can't be ignored in history. In order to have a deep analysis on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leaded by the CCP, find out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ex-